



(1905-1998)

德高昭然

——纪念汪德昭院士

高天赋

(中国科学院声学所 北京 100080)

“价值”作为一个经济学名词，其亲和力确实惊人，渗透各种缝隙，覆盖了许多待装饰事物的表面，更流行于“观念”之类的精神领域。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依赖别人活着，同时还以自己的贡献帮助别人活着，因此人和人之间都是交易，为了保证交易的公平性，必然要有“价”和“值”。不过也有很多很多例外。比如，我国许多老科学家放弃优裕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回到祖国，正是他们的播种和耕耘，才有了今日虽还不丰满但已成林的科技园地，然而他们多半不会接受此类颂扬，说是实现了他们人生的“自我价值”，驱使他们回国的是那无价的爱国之心。世上固然存在着讨价还价涵义广泛的“市场”，然而世上又真正存在着另一个无价又无形的天地，这是爱国心、民族魂，这是爱心、同情心，这是品德和情操……，汪先生正是这批情操高尚的老科学家中的杰出的一员，正是活在那无价又无形因此也永垂不朽的天地里。我们纪念汪先生，是纪念他的崇高的爱国精神，他的晶莹剔透的人格，他的热情、无私和公正，同时还

纪念他对科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感谢他为我国科学园地培养了今已绿树成荫的水声学。

汪先生江苏灌云人，生于1905年12月20日，卒于1998年12月28日，享年93岁。1923年-1933年就读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1933年留学比利时，1934年6月当法国著名科学家朗之万的研究生，并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汪先生一生受导师的影响极深，每每以崇敬的感情谈及他的导师。1940年获巴黎大学国家博士，并被评议为最高荣誉级。1938年-1956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任职，历任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研究指导主任，并兼任法国石英公司顾问，法国原子能委员会技术指导，英国同位素发展公司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兼任法国国防第四研究组成员。留法期间，成绩卓然，硕果累累。博士论文《大小离子平衡态研究》获得一年一度一名的法国科学院“虞格”大奖，并被誉为“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他试验证实了负的光致效应的存在，巴黎大学J.卡巴纳院士称赞他的实验是“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汪

先生是最早进行人工放射性元素工业应用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打破常规,用弱 β 射线照射照相干板的方法来控制药膜的厚度,取得圆满成功;他采用多种措施,改进实验方法,得出了化学液体吸收超声的比较准确的数据,被国际超声学者所引用;他在法国成功地研制出超灵敏度静电计和超微量天平,其中超灵敏度静电计被命名为“居里-汪氏型”;二战期间,根据战争需要,他出色的完成了“主动声纳加大功率”的研究课题。

汪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能够不顾自身安危把自己要发表的文章有意送给已被德国纳粹关进牢狱的朗之万评审,他能够不顾自身经济,为抗议亲德主管而愤然离开朗之万实验室。汪先生是个爱国者,在“五四”运动中,14岁的他加入了“少年学会”,在巴黎第一次挂起五星红旗,在“向科学进军”的1956年响应祖国召唤而回国。

回国之后,汪先生把自己的赤子之心跳动在水声学的创立和发展——从1958年受国家重托筹建国防水声学;从当年决定从北大、清华和南大等高校抽调100名差半年到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从1959年组织中苏联合水声考察;从1960年以后有关传播、混响、噪声、内波、

起伏等水声物理研究的部署;从水声工程和水声物理相辅相成发展的前瞻;从一所三站研究体制的建立;从“由近及远、由浅入深、(频率)由高到低”水声考察策略的提出;从研究方法的传授;乃至从1975年起草我国海岸水声预警体系的研究发展规划;1978年以其73岁高龄亲自率队赴西沙作我国首次深海水声试验。所有这些,都无不体现出他的热情、勇气、严谨,又无不显示他的远见卓识和出类拔萃的组织才能。正是在他的培养和领导之下,声学所的水声人才辈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成果,使浅海声学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汪先生也把他的执著的爱国激情倾注于声学所的建立、发展和壮大,特别是那腥风血雨过后的日子里与马先生、应先生一起为重建声学所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在他当所长的岁月里,声学所蒸蒸向上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汪先生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得到了许多高奖赏,我国和法国都给予他极高荣誉,所有这些都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然而令我们敬仰的却是他那爱国激情和正直昭示之下的音容。道德上的无暇是无价的,不是当今“物流”中人人都能做到的。汪先生永垂不朽!